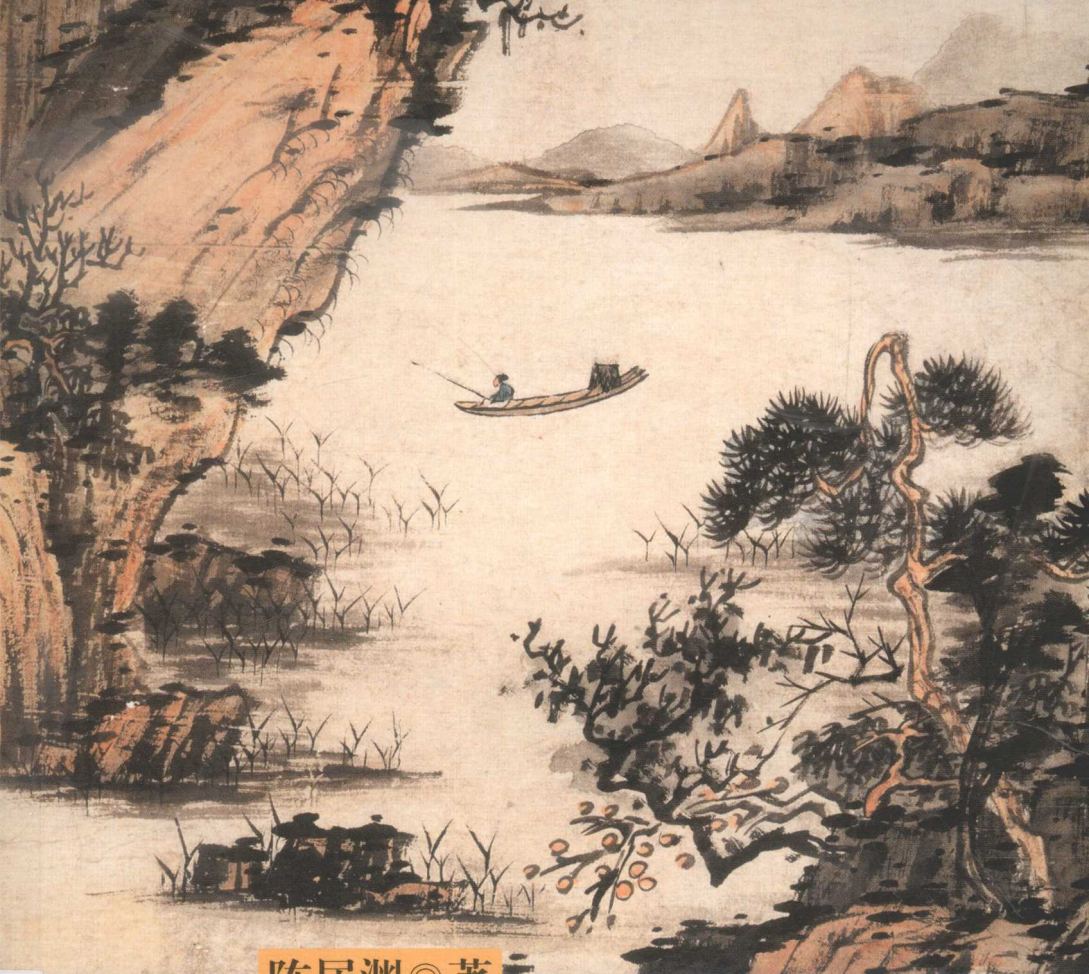




陈居渊◎著

复旦中国哲学书系

清代诗歌 与王学

王门后学以及晚明文学新思潮，
直接构成了清代诗歌创作风气的思想背景，
哲学与诗歌的水乳交融，
展现了清代诗人情感世界的
丰富性。

上海人民出版社

清代诗歌与王学

陈居渊◎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诗歌与王学/陈居渊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复旦中国哲学书系)

ISBN 978-7-208-13036-4

I. ①清… II. ①陈…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清代
②王守仁(1472~1528)-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I207.2 ②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0839 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封面装帧 零创意文化



清代诗歌与王学

陈居渊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75 插页 4 字数 231,000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036-4/B·1122

定价 48.00 元

序

我很高兴陈居渊博士的《清代诗歌与王学》即将出版。因而同样高兴地接受了他嘱托：为这部书写一篇序。

书名虽是《清代诗歌与王学》，但其中所谓“王学”主要是指王阳明学派中的李贽一系，也包括了明代后期与此相联系的重个体、崇自我的意识。通常所说的晚明文学新思潮，就是此种意识的体现。就这一点而论，本书所阐述的其实也是晚明文学新思潮与清代诗歌的关系。

晚明文学新思潮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联系，早就经人指出，此处毋庸赘陈。当然，五四新文学的形成离不开外国文学的影响，但如果中国文学本身并不具备接受其影响的基础，五四新文学也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基础不是别的，就是明代后期出现的重个体、崇自我的意识。

不过，从公元 1644 年明王朝解体、清王朝正式宣告诞生，到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中间相距 270 余年。此种意识在这 270 余年中是已经消失，抑或继续存在甚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呢？这是研究我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但目前在这方面似还缺乏系统的研究。陈居渊博士此书，则是回答上述问题的最早一部著作。

根据他的意见，此种意识在清代诗歌中并未湮没。吴伟业和王士禛的诗虽已失掉晚明文学的棱角，但却仍以尊重自我为其主要内涵；尽管这种尊重似乎有点病态。到袁枚重新提出“性灵”，实可视为向晚明袁宏道“性灵说”的复归。至于龚自珍，他把“我”作为宇宙的主宰和把人性归结为“私”，固然与王守仁、李贽的哲学思想相通（不管他是否读过这两人的著作，他的上述观点在思想体系上却与他们的学说是一脉

相承的),他的诗歌创作更较晚明诗跨出了新的,重大的一步。正如本书在分析龚诗时所说:“(龚诗)无论是追求孤注一掷地显示个人的力量,还是把爱情作为生命中的最主要的因素来追求,都意味着以个体——自我为中心而漠视群体。”我在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在这样的追求中实已包含若干可以缓慢地演变为五四新文学的成分。

作者在说明上述意见时,提出相应的材料,也作了不少的论证。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能够成立的。当然,如要获得多数同行的赞同,还应有更丰富的材料和更充分的论证;但作为这方面的一部最早的著作,却已具备了可供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最后,说几句题外的话:本书是根据作者同名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他写这一题目的论文,又与我的建议有关。但我对此书的出版很觉高兴,倒并不仅仅是基于这一渊源。近20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明、清文学中的下列问题:明、清文学与明清哲学的关系;明代文学——特别是晚明文学新思潮——与清代文学的联系;明、清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联系。“清代诗歌与王学”则是这些问题的交汇点。我虽然只读过他的博士论文而没有来得及读其由此扩充而成的全书,但从其论文也可知道:一种与社会进程相一致的思想,在其出现以后,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打击和挫折,总是会艰难曲折地向前行进,并最终在与世界大潮的汇合中导致新的飞跃;文学也就在这样的过程里演进并最终获得新的生命。对于这种必然的趋势,没有人能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我想,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

章培恒

1994年2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1
---------	---

绪论	1
----------	---

上篇 清初诗坛与王学

第一章 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修正和文人的反应	11
-----------------------------	----

一、两股思潮	12
--------------	----

二、文人与王学	20
---------------	----

第二章 清初诗风的嬗变	36
-------------------	----

一、晚明精神的逆转回流	36
-------------------	----

二、儒家诗教的再确立	44
------------------	----

第三章 涌动的潜流	61
-----------------	----

一、《圆圆曲》和《鸳湖曲》	61
---------------------	----

二、言志与主情	86
---------------	----

三、神韵透视	99
--------------	----

中篇 清中叶诗坛与王学

第四章 资本主义萌芽和王学在新形势下的复苏	129
-----------------------------	-----

一、商业的复兴	129
---------------	-----

二、理欲之辨	138
第五章 儒家诗教的强化与新声的出现	155
一、复古与师古	156
二、清新可喜之音	168
第六章 性灵的旋风	180
一、性灵界说	181
二、情欲与生趣	186
三、重自我与尊德性	205
下篇 清末诗坛与王学	
第七章 堕向情天	225
第八章 落花的自尊	234
第九章 社会情绪世界的真实纪录	243
结束语	252
参考文献	255
后记	262

绪 论

王阳明的“心学”，又称“阳明学”，简称“王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崛起于16世纪初期，作为理学内部同朱熹学说相对立的异军，曾在明中期以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占据中心位置达百年以上，即所谓“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1]。这是清代官方学者对此总结性的感叹。同时，这股“横流”也漫进了晚明的文学领域，其结果不只是思想界“不复以稽古为事”，而且在文坛上更掀起了声势壮观的以肯定人的个性与欲望为基本内容的晚明文学新潮流。不过，这股新潮流并没有按照逻辑继续向前推进，时至明末便出现了消退的趋向，当历史进入清代之后，却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回流。然而，这股新思潮在度过了清初的沉寂期之后，又复兴于清代中叶，并在鸦片战争前后又形成了一个高潮。可以认为：清代诗歌的发展，始终是与“王学”以及晚明文学新精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诗歌发展总是与一定的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哲学思想的发展，也就没有文学的发展。如魏晋时期玄风大炽，玄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以颓废、悲观、消极为基本特点的诗歌创作，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音调。透过服药、饮酒等诗歌主要内容的表层，其底蕴正是“任达旷放”，这无疑是以玄学观念中的注重本体、崇尚自然为哲学基础的。又如唐代是佛学的全盛时期，尤其是禅宗，被称为身被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同样也影响了许多文人的心态，只要一瞥所谓盛唐山水田园派诗人，几

乎没有一人不深受禅趣的浸染。如王维生前身后都有“天下文宗”、“诗佛”美称,对后世影响巨大。清初诗人王士禛就说“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可见禅宗思想在唐代诗歌创作中的影响已不局限于山水田园诗人,而成为诗人吟诗的一条普遍原则了。宋代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理学以儒家思想为主,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同时也汲取了佛学的思想与理论。理学盛行对宋诗影响很深,因此决定了“宋人好言理”的诗歌特征。总之,每当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兴起,伴随着它的必然是人们观念的更新,从而改变了以往观察事物的方式,并在文学创作中形成新的风格,开拓出新的意境。同样,旧的哲学思想依然会时时泛起,继续影响着当时的人们,从而有意无意地在文学作品中保留着它的痕迹,甚至再度演进为一种文学思潮,尽管它并非是前代文学的复活。

纵观清代诗坛风会的演变,固然有其诗歌发展的自身机制,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又与王学和晚明文学新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清代诗歌演变递嬗的规律和原因,从王学这个视角来观照清代诗歌,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未被发掘而蕴藏在深层的东西。哲学是时代情感最为深思的人的欲望和追求,而诗人则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因此,诗人在表达自己的情感思想时,自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哲学的影响。虽然哲学与文学二者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但是它们却是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如果说文学就是人学,那么诗歌则是以语言构织的幻想,展示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全部丰富性。在文学作品的审美意境中,必然折射出创作主体的世界观和哲学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诗歌创作的风貌。遗憾的是,我们以往对清代诗歌的研究,在这方面显得十分薄弱,即使谈到诗歌演变与哲学思潮的联系时,也是浮光掠影,点到而止;或者停留在表层的直接联系上,因此“笼统”和“空泛”便成为两者共同的特征。那么王学和晚明文学新精神究竟怎样影响了清代诗歌的发展?为什么会有一个由隐晦到明显的发展过程?具体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其间是否有规律可循?等等,本书试图对上述诸问题进行新的探讨。

要对王学进行界定是困难的,且不说自王阳明后有诸如黄宗羲按地域分布来划分酌定的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和泰州王学等,而且又有按其学术特点区分的虚无派、日用派、主静派、主敬派和主事派等。因此,要在如此繁多的王学诸门诸派中划定一条精确的王学基本定义,显然是有困难的。本书所谓的王学,实则是一种广义的王学概念,即在哲学基础上与王学有相通之处,都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则是专指王门后学——泰州王学一路。

什么是“心学”?王阳明对此有一段极为简要的说明:“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王阳明当然没有摆脱理学家的立场,在要求人们服从所谓“天理”这一点上,他与朱熹并无分歧。不过,他把“心”(良知)视为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的统一相联系,王阳明在强调主体必须遵循天理的同时,也多少注意到个体具有自主性的特点,并肯定在道德践履与道德教育中都应当尊重个体的意愿。所以王阳明又发了以下一些议论: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2]

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3]

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4]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5]

在王阳明的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隐隐感觉到,个人良心的内容已偏离了现实的道德标准,那种每一个人的一生必须反复地通过榜样和

褒贬受到这一道德灌输之下的人心,那些被道德法典压迫下的愚夫愚妇正在崛起。可以说,这正是意味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在哲学上的一种反映。

王阳明的这些思想,在王学分化后的各派中均有继承、发展和改造,其中尤以泰州王学更为显著。黄宗羲曾指出:“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6]

“泰州”和“龙溪”,分别指王艮和王畿。王艮是泰州学派的创立者,颜山农、何心隐均系泰州学派的骨干成员。王畿系浙中王门,是王学分化后的虚无派的创立者,周汝登、管志道、陶望龄等均系该派的中坚。二派都程度不等地发展了王阳明的上述思想,如王畿被“士之浮诞不逞者”奉为至尊,周汝登“举所谓秉彝者而抹杀之”,管志道“以仁义为桎梏”,陶望龄则“重富贵而轻名节”。又如泰州学派从一切依于“己”的观点出发,强调儒家经典并不是真理的标准,只是“印证吾心”的工具,并将王阳明的“人皆可为圣人”的命题代之以“满街都是圣人”。颜钧甚至认为:“人之好贪财色,皆自性生,其一时之所为,实天机之发,不可壅阏之。”何心隐公开主张“农工之超而为商贾,商贾之超而为士,士之超而为圣贤”,把农商工贾提到“圣人”的地位。对此,黄宗羲将其概括为“非名教所能羁络”、“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掀翻天地”三个特点,如用现代的语言来表示,即具有反对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古代伦理道德观念,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表现出强烈的涉世精神。由于这两派的思想已经背离了王阳明学说的主旨,但却是由王阳明学说发展而来,因此习惯上称

其为“王门后学”。

在王门后学思想的推动下,晚明文学领域兴起了一股声势颇为壮观的文学解放思潮。一批具有叛逆倾向和革新精神的文学新人接踵登上文坛,提出了一系列同传统文学观念相异的主张。他们已经不再是一般地提倡道己所欲言,而是明确要求取缔“止乎礼义”、“温柔敦厚”、“依于理道”、“合乎法度”等从内容到形式的一切清规戒律,从孔孟之道为主体的文学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作为这股思潮的杰出代表,就是被当时视为异端之尤的李贽。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人。他曾师从王艮之子王襞,并多次问学于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他的思想大致导源于王门后学中的泰州王学。如他认为王门后学中惟有泰州之学得王阳明正传,“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7]。又表示“若知阳明先生不死,则龙溪先生不死,鲁源、翰峰二先生之与群公于余也皆不死矣”^[8]。他曾在《自赞》一文中,毫不掩饰自己的个性:“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违,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李贽的文学理论,就是著名的“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真心,或为“一念之本心”,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章培恒先生曾指出:李贽所要求的“童心”,不仅存在于儿童时代,而且是人的一生都应该具有的,什么时候没有了“童心”,什么时候也就不成其为“真人”。所以,“童心”实即“真人”之“心”。其次,作为“童心”对立面的“闻见道理”,乃是后天的一切知识的总称(因为后天的所有知识都不得不通过“闻见”而获得)。这也就意味着,“真人”之“心”不仅是“最初一念之本心”,而且是不应该受后天的知识的影响的,从而完全是人的先天本性。再次,

作为与“闻见道理”相对的人的先天本性——童心,不仅是否定了当时的一切传统道德观念,而且是否定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童心说”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1)引导作家摆脱以《六经》、《论语》、《孟子》为代表的传统观念的束缚。(2)由于把“童心”跟“从外入”的“闻见道理”相对立,也就有可能增强作家对外界习惯势力等的斗争精神。(3)在“童心”的名义下,引入肯定欲望和尊重个性的内容。^[9]“童心说”所要求于文学的以上三点,正是晚明文学新潮流的基本内容。如《金瓶梅词话》和“三言”、“二拍”就是属于这一时期的小说,或者汤显祖的剧本和袁宏道等人的诗文,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样的特色。

上面我已经说过,王阳明的“心学”虽然是将传统道德观念从外界事物移入人之内心,然而并没有完全摆脱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基本立场。不过,由于他又一再强调尊重个体的内在意愿,因此王阳明的“心”不再囿于服从单一的“天理”层面,而是具有“不假外求”超脱于传统道德之上的灵明之物。所以李贽的“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从根本上来说,实由王阳明“心自然会知”的学说发展而来。如果我们把李贽的“童心说”作为晚明文学新思潮在思想上的最充分的体现,那么晚明文学新思潮是跟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探讨清代诗歌与王学二者之间的联系,其中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首先,虽然二者同属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两个不同部类,但是仍然会受到学科和专业的限制,二者之间的跨度难以把握。其次,文学与哲学虽然相互影响、渗透,除了直接的联系,它们之间往往是“暗度陈仓”、“半遮半掩”地经过了“内化”的变异。再次,还有理论准备和全面掌握材料的困难,且不谈清代所作诗歌到底有多少,单据收录于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的清代诗人就有6100余家,总辑诗歌达27000余首。面对这份庞大的诗歌遗产,至今尚未对它进行认真、系统的清理和研究。至于挖掘其中蕴藏着可以论证王学与清代诗歌相关的内容,还缺乏从定量到定性的比较研究。

诸如上述的实际困难,固然不能待排除之后,再尝试对以上问题作答。但是任何作答的尝试,毫无疑问都需要考虑到这些难点。从这一

意义上说,本书的撰写,也仅仅是一种新的尝试。

注释:

[1] 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一百二十三《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子部三十三,杂家类七,第5417册,第886页。

[2] 王阳明:《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3] 王阳明:《传习录中·启问道通书》,《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4] 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5] 王阳明:《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6]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下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03页。

[7] 李贽认为:“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径往江西见王都堂,欲与之辩质所悟。此尚以朋友往也。后自知其不如,乃从而卒業焉。故心斋亦得闻圣人之道,此其气骨为何如者!心斋之后为徐波石,为颜山农。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波石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云龙风虎,各从其类,然哉!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为赵大洲,大洲之后为邓豁渠;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为何心隐,心隐之后为钱怀苏,为程后台;一代高似一代。所谓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心隐以布衣出头倡道而遭横死,近溪虽得免于难,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见容于张太岳。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今上人以此进道,又谁能先之乎?故称之为曰大孝。”(《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李贽文集》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5页)

[8] 李贽:《阳明先生道学钞》卷八下,《阳明先生年谱后语》,《续修四库全书》本,第937册,第699—700页。

[9] 章培恒:《明代的文学与哲学》,《复旦学报》1989年第1期。

上篇 清初诗坛与王学

